

陶然中短篇小說選

陶然
——著

天外歌聲 哼出的淚滴

我需要有頭有尾有中段的那種小說，有因有果有過程的那種小說，有起有落有高潮的那種小說。天從人願，我在《陶然中短篇小說選》裡找到了！



釀文學 PG0703



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

——陶然中短篇小說選

作 者 陶 然
責任編輯 林泰宏
圖文排版 鄭佳雯
封面設計 陳佩蓉

出版策劃 釀出版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
國家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
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
博訊書網：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

出版日期 2012年3月 BOD一版
定 價 4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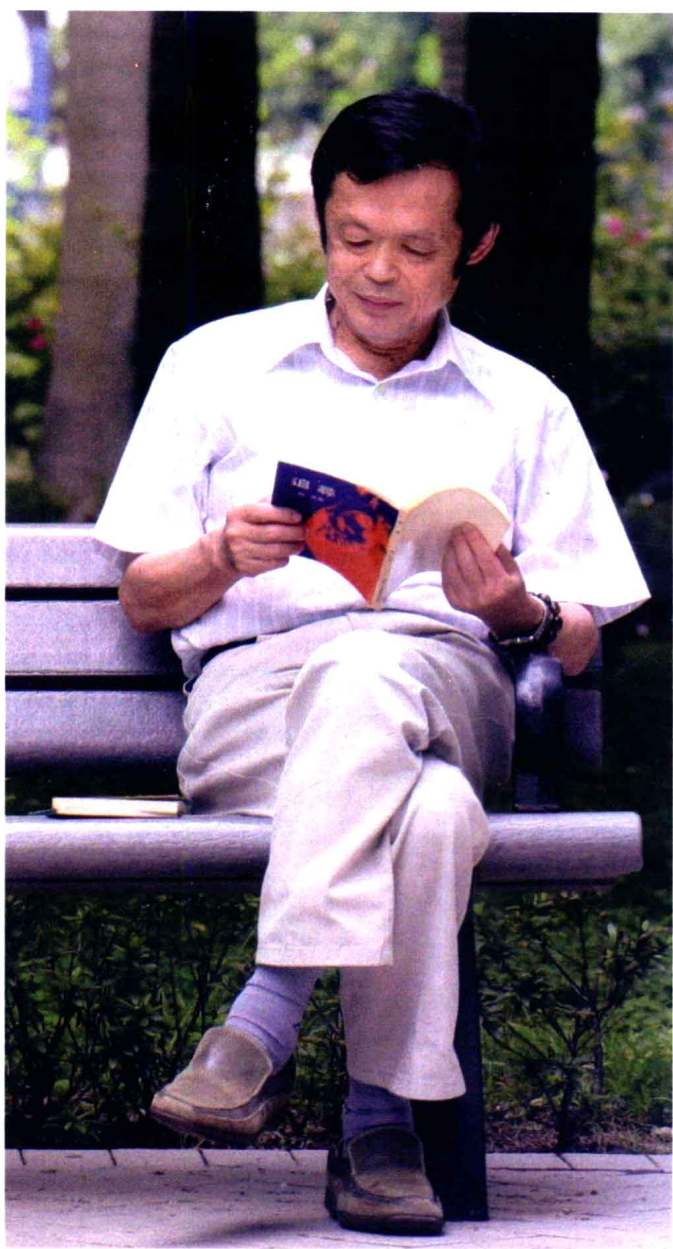
Printed in Taiwan

陶然中短篇小說選

陶然
—
著

天外歌聲 哼出的淚滴





2011年5月，陶然攝於香港鯪魚涌公園。



2005年8月，應邀任「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」（2003-2004）散文組評審委員。

左起：許迪鏘、黃國彬、張錯、陶然、黃仲鳴。



2002年6月1日影於印尼雅加達「印華文聯」首次文學座談會。

左起：賴松溪、廖啟煌、陶然、李靖、凡夫。



2007年5月陶然與痲弦（左二）、秦嶺雪（右一）合影於香港九龍「原住民」西餐館。



2003年9月4日，在香港三聯書店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「感覺上海」對談會上。左為王安憶，右為李歐梵，中間為主持人陶然。



2011年9月25日，陶然與楊絳（右）合影於北京楊府。



2011年11月22日，中國作家協會設晚宴招待出席「中國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」的港澳台及海外作家代表，陶然與鐵凝主席（左）合影。

壓力下的完卵

王鼎鈞

為了給寫作班找教材，我讀了《陶然中短篇小說選》中的二十二個短篇。

既然是給寫短篇的人觀摩學習，我的第一志願是力求其短。現在已很少聽見有人論說短篇應該多長多短，當年的說法是「三萬字以下」，我總覺得三萬字太長了，在寫作班上，三萬字的長文不易朗讀，不易分析，不易統攝。海明威要求短篇可以「站著一次讀完」，我則盼望短篇可以坐著一次講完。

在寫作技巧方面，短篇小說講究「單一事件，時間地點集中，最經濟的手法」。三萬字的短篇多半難以支持這個說法，看起來那長長的短篇很像是長篇的一章，或者是長篇的縮寫，無法強調短篇小說的特點。

我也知道，自「現代小說」興起，許多作家對「時間地點集中」云云全拋棄了，出現「有多少個短篇、就有多少種結構形式」的燦爛局面，這當然是重要的發展，但是增加學習上的困難。有人批評新詩，說它沒有形成典律，沒有穩定的體裁，不利學習，看起來目前標榜「現代」的短篇小說也是如此，我只能在寫作班把「現代小說」介紹給大家欣賞，卻不敢教他們如此起步。

還有，我們這個寫作班是業餘的文化活動，大都對文學沒有太大的野心，但願他們藉短篇小說的欣賞，能夠解釋自己的人生經驗，迅速掌握事件的重點，有因果觀念，有組織能力，並且知道如何把一個故事說得精彩，如此他們都可以不虛此行。我需要有頭有尾有中段的那種小說，有因有果有過程的那種小說，有起有落有高潮的那種小說。

天從人願，我在《陶然中短篇小說選》裡找到許多篇這樣的小說。

我先找最短的。這本書收錄二十二個短篇，其中四篇每篇都在四千字以內。

一篇〈身份確認〉，寫一對年輕夫婦偷渡到香港，丈夫找到工作，上班去了，妻子在家寂寞，上街閒逛，不幸被一個警察窺破行藏，尾隨到她的住所，以逮捕遣返為要挾，實行「性侵」。人物只有兩個，妻子和警察，那個丈夫沒有出場。時間壓縮在丈夫上班以後、下班以前，空間集中在她居住的公寓房間之內，過程之短促與心理反應之艱難成反比。寥寥幾筆就寫出社會背景如隱形的天羅地網，寥寥幾筆就寫出一個角色明晰的形象，連未露面的丈夫也如見其人。故事完整，結構完整，人物形象完整，我們的學友能得其一，就可以把作品拿出來給人家看了。

另一篇〈主權轉移〉也在四千字以內。這篇小說寫女老闆和男職員有性愛關係，我們見過許多小說電影，男老闆和女秘書有一個秘密的香巢，〈主權轉移〉反過來寫，給我們另一種啟發，寫作的難度也隨之提高。男女身份懸殊，情意密藏不露，寫來張力飽滿，確非易易。女尊男卑，予奪操之在女，這個男子以極其銳敏的感覺患得患失，見微知著，這個「微」正是短篇小說需要的簡單，這是「大風起於萍末」那樣的簡單，「萍末」是一隻盜杯，男職員曾經送了一隻盜杯給女老闆，結果他發現女老闆把這隻杯子轉送給另一個男職員了！小說以〈主權轉移〉為題，點睛之筆勝過千言萬語。

我覺得〈身份確認〉寫的是權力的壓力，〈主權轉移〉寫的是階級的壓力。第三篇〈競爭〉，寫二十八歲單身女子依表姐和表姐夫留居香港，面對許多男人貪婪的企圖，只有忍辱應付，她有「性別的壓力」。第四篇〈砍〉古事新編，寫關羽再來，藏刀棄馬，換穿西裝，到劉備經營的商店裡做一名店員，劉備商場失利，裁減員工，關羽首當其衝，可稱為社會轉型的壓力。這個發現很有意思。我急忙再看以外各篇。

這二十二個短篇中有十六篇每篇都在六千字上下，據揣想，一定是編者設定了字數。編輯要分配版面，作空間設計，難免有些匠氣，給媒體寫作有經驗的作家都能增尺減寸，妥為配合，作家伸縮由心，最能看出他的功力才思，也顯出他跟編者之間的友誼。這本來是作家的成熟老練之處，可是啼聲初試的人如要嶄露頭角，必須對這一點訣竅會心揣摩。這十六篇小說使人推想寫作的原始過程和巧妙，未必和事實經過符合，也無須符合。

這十六個短篇也幾乎都是寫壓力。

例如〈窺〉，寫香港居住空間的壓力。一對年輕夫婦的居室本已侷促，為了減輕負擔，又把小小的閣樓租給一個單身男子。妻子時時擔心性生活被房客偷窺，精神緊張，閣樓居高臨下，使壓力更形象化，香港天氣酷熱，使壓力幾乎成為觸覺，這些地方寫得極好。後來男房客對女子提出要挾，壓力遞增，女子終被擊敗，在高潮中完成短篇小說的情節。這一篇應該算是壓力文學的異品。

像〈旋轉舞台〉，寫歌星秦少聲成名的壓力。他和另一歌星江金廊競賽，產生「好來塢式的恐懼」，據報導，好來塢的明星佔盡繁華，但是人人眼中露出恐懼，他們怕失敗，怕被別人取代，「勝利的滋味」固然痛快淋漓，「風水輪流轉」的陰影也驅之不去，功名利祿之中人豈止身不由己，魂也不由己，我們只見憤怒之下無智慧，嫉妒之下無美德。這一篇堪稱壓力文學的珍品。

像〈碧玉岩〉，一個中年男子由大陸來到台北，受大陸友人之託，帶東西給一位女郎。他在台北住了三天，跟女郎有三次單獨的約會，最後兩人夜晚登臨高丘，俯瞰台北市萬家燈火，此情此境，在任何小說中都會發生一些激烈的動作，這裡卻「甚麼也沒發生」。表面平靜，尋常言談舉止中充滿「性」的張力，情懷如一根游絲繫在兩人身上，無形無影，中心癢癢，卻又搔爬不著。這一篇小說以寫感覺為主，謎樣的境界，詩一樣的情懷，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！這一篇是壓力文學的雅品。

我想起前賢論小說，言必稱人物性格，「有甚麼樣的性格就有甚麼樣的行為」。現在我讀到的這些小說，人物行為並非一定由性格產生，大半由環境壓力產生，壓力太大，甚麼性格都得有一樣的回應。一個偷渡的弱女子，面對一個流氓式的警察，她怎麼辦？殺死警察？殺死自己？狂喊救命，寧可送進移民署的拘留所？知道她們夫婦為偷渡花了多大的代價嗎？知道移民署的拘留所的種種黑幕嗎？在這種致命的壓力下，不論剛強、圓滑、豪爽、羞澀，都一樣得滿足那警察的慾望，以求苟安。現實壓碎一切性格，卻成就了一篇一篇的好小說。

我告訴文友們，看這些小說情節的脈絡如此清晰，看小說家的思路如此清晰，其智慧貴在能捨。長篇是海納百川似的「取」，短篇是快刀斬麻似的「捨」。看這些短篇小說修辭如此以少勝多，遺響如此有餘不盡，其秘訣貴在能「藏」。範本當前，我把「捨」的英姿情懷介紹給他們看，把「藏」的深心大巧介紹給他們想。播種在人，生長在天，因緣俱在，功不唐捐。

北往南來漂離筆

——陶然

廖偉棠

「南來作家這個名字現在簡直帶點原罪的意思。」陶然皺眉說道。

香港文壇中提到「南來作家」（即從內地來港的作家），莫名總帶點貶義，似乎總不如「土生土長」來得響亮，而且這個名字下面籠罩了一大群不同風格、水平的人，率為武斷。與陶然見面，剛坐下他就說：「南來作家這個稱呼其實我一直不是很認同。」即使中港研究者都這麼定義他，有的還把他作為南來作家的代表，即使他已經來港三十八年。但無論是內地文學史書寫的熱衷關注，還是本地讀者的有意無意忽略，陶然那一代南來或南遷作家，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經歷都是其時代的另一種註腳。

相對於「南來」，我更感興趣的是他的「北往」，他最初是從印尼去北京的，才又從北京來到香港，如此南來北往，決定了他的作品中的流離之味。雖然說話還帶著一點點口音，陶然其實原籍廣東，但他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市出生長大，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，一如我們所知的彼時華僑知識家庭，他和他的家庭都被捲入歷史的諸多誤會的波瀾之中……

據說陶然的外祖父四十年代在雅加達任親國民黨報紙《天聲日報》社長，五十年代到香港，遂被統戰回國，結果回國一年就因為土改被鬥，在拘留所內含冤自殺。但這件事沒有影響其後十年在萬隆

的左派學校學習的少年陶然，他相信國家在變好，每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、閱讀《人民畫報》，學得流利的普通話，並且耽讀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等從萬里之外漂流至此的革命文學。終於一九六〇年的一天，他的母親無奈地對他說：「既然你這麼愛國，你就回國讀書去吧！」母親並不認同共產黨，她的考慮，當然還有印尼日益高漲的排華氣氛，少年陶然尚未了然日後的恐怖，只是為能夠回國建設而興高采烈。

印尼風情沒有給陶然日後的創作留下太大影響，他的心一早飛到北方去了。陶然和哥哥、兩個姐姐來到廣州，哥哥因為超齡留下在廣州務工，陶然和姐姐因為對廣州的失望和對北京的嚮往，堅決要求赴京。「廣州碼頭飄滿萬國旗——都是市民晾曬的衣服。在街上問路竟被隨意指點到反方向，在巴士上說下車，售票員呵斥應該說落車（粵語）！」敲鑼打鼓被歡迎的華僑子弟，進入廣州市內遭遇了一片混亂，這落差至今說起仍然覺得不可思議。坐了三天三夜火車，膽粗粗的陶然來到幾乎舉目無親的北京，就讀於天安門旁邊的北京六中——清朝的吳三桂馬房，天子腳下卻好不逍遙。「相對於廣州的破落，北京的建築雖然也灰，但氣派大多了，大馬路大建築，印尼也完全見不到。北京的文化素質更是比廣州高很多。」

但政治氣氛北京也濃厚得多，書迷陶然發現找不到太多想看的書，「頂多是楊朔、劉白羽等官方作家作品，解放前作家只有魯迅的書，連錢鍾書都沒有，甚至《紅與黑》都看不到。」他對看不到《紅與黑》耿耿於懷，「十九世紀的浪漫小說，不過因為故事中于連和市長夫人的私情而被害怕有負面作用，成為禁書。」

「那時只好拚命去看電影，都是社會主義電影，當時還是困難時期，物質上吃不飽，精神上也飢渴。」他的一個同學餓到去公園偷榆樹葉吃，結果被鬥。華僑子弟也不敢讓海外寄東西，否則會被當

作資產階級。全靠一個香港來的同學，總是偷偷叫上陶然等去全聚德吃烤鴨，「他認識那廚房師傅，一進門人家就知道他要吃什麼，只是吃完他就一再叮囑我們千萬別說出去。」

上了北京師範大學，遭遇了文革，陶然因為特殊的身份一直「被迫」成為「逍遙派」，因為沒有紅衛兵組織要華僑子弟。唯一參與了一九六六年的串聯，是沙勞越礦工子弟組織的「赤衛隊」——可以說是「紅衛兵」的山寨版，從北京到武漢到廣州、泉州，縱貫下來等於免費旅遊。後來一個紅衛兵組織接納了他，他也只有在別人貼大字報的時候拎漿糊的資格，連大字報都沒有寫過。

因為逍遙，更可以看書，他和幾個同學「佔領」了一間空置的女生宿舍，天天躲在裡面看書。「能看的書都看了，六八年的時候有一個神秘的同學來跟我說可以提供禁書給我看，條件是要用海外寄來的日本立體照片來換。他帶我去中國書店的秘密書庫買十八、九世紀外國的小說，充滿了誘惑。」立體照片和禁書，誘惑對於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，陶然選擇了後者。

也是那個時候，他認識了影響其一生的人：著名詩人蔡其矯。「當時崇拜詩人，五十年代初蔡其矯曾在文學講習所教小說，六十年代被下放，一個認識他的同學介紹了我們認識，於是開始通信。」其實當時明知蔡其矯已經被「打倒」，青年陶然還是堅持與他通信談文學，這通信持續了幾十年，累積數百封，直到前幾年蔡其矯逝世。對陶然影響最大的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封信，蔡其矯說：「你是學文學的，為什麼不拿起你的筆？我非常反感現在社會流行的文學無用論，要是換了我，即使燒成灰也要寫。」在他的鼓勵下，陶然開始寫作。

一九七二年分配，大學生面向農村，分配並不公平，和工宣隊天天喝酒的人就可以留在北京，這點令陶然很氣憤。他被分到陌生的江西，父親從印尼來信要他回印尼，其實當時他也對北京的政治現實清醒，「留在大陸肯定沒有希望，你的出身已經成為你的原罪。」但他走之前做出了一個非常大膽

的舉動，他不辭而別跑去新疆探望被分配到那裡的女友，校方因此對他進行了缺席的批判。這一段亂世中的愛情故事，曾化身出現在陶然日後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《與你同行》中，而新疆，也因此成為他日後無數篇散文的主題，不但象徵了青春的絕望愛情，也象徵了青春不顧一切的自由。

一九七三年二月陶然獲批香港通行證，但拖到九月才來港。全因為不捨，新疆的女友又趕回北京和他惜別。政治對愛情的壓力凡人又如何化解，「在這批判鬥爭的世界裡，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。」羅大佑〈愛人同志〉唱的絕對真實，愛情中甚至要學習保護對方，「總之很淒慘，當時的感覺……她是幹部家庭出身，家人對海外關係非常敏感……在當時環境下，也可以理解吧。」

陶然來到香港，卻不能回印尼，因為印尼早就規定不歡迎去過共產國家的人回流，他在離開之時已經按手印宣誓接受這個規定。於是他只好滯留香港，「從高度政治化的北京來到高度商業化的香港，落差太大了，人情淡薄馬上感到。」當時香港深陷全球的能源危機，九點之後霓虹全滅，市面蕭條。大學畢業的陶然去觀塘應聘做雜工，竟也因為不懂廣東話被歧視——「步出工廠後，聽到後面那個工頭說：車！廣東話都唔識仲想做工！」他覺得很辛酸，「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，要求並不高，不過是想當一個最低的雜工而已。」日後他的小說，充滿了那些因為身份歧視而被侮辱被傷害的人，不能說和這些實際的經歷無關。

當時陶然失業的生活，就如他的老朋友古劍的描述，頗有些離奇：「陶然還多少有海外的接濟，『堅持』失業了兩年，去夜校補習英文。那時教育也腐敗，竟有語文教師懶到登報請人批改作文，眉批、批語，每班作文總評，一樣不少，每本一元錢。」——陶然說沒有這麼多，一本也就兩毫子到五毫子。

這樣的生活方便了寫作，一九七四年《週末報》刊登了他的小說處女作〈冬夜〉，「敘述上受

到海明威〈殺人者〉的影響，內容靈感則來自在一家餐廳意外遇見六中同學羅烈——他已經是當時香港著名的武打明星，所謂天下第一拳，我不敢與他相認，小說就寫了這種心情。」和很多南來作家不同，陶然來港的第一篇小說就直接寫作香港題材，而不是大陸的回憶。

「因為文學的關係，認識了後來的好友古劍，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他在銅鑼灣窮極無聊，邊鞦韆後閒逛，經過豪華戲院看見一個乞丐，我不禁對古劍說：將來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變成這樣呢——」陶然回憶起這段日子還是唏噓，這就是七十年代大陸來港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普遍困境。幸好一九七五年古劍進入《體育周報》，「有一天在牆角邊看到不少應徵信，我好奇拿來翻看。裡面竟有陶然的，那時他署名梅傲霜。此時正好有人辭職，就向老闆推薦，他就這樣成了同事，與葉輝三人撐起《體育周報》。」古劍回憶裡這麼說，陶然補充了細節，也是活靈活現，「葉輝和古劍，加上一個叫阿球的清潔工人天天下棋，下得昏天黑地。我在旁邊寫稿寫到七八點鐘就走，他們還在下棋。」

蔡其矯依然是陶然的良師，繼續和他通信，並且鼓勵他堅持寫作、盡力融入香港社會。七十年代香港文化也頗激盪，但陶然的性格和身份決定他沒有認識更多的同道人，諸多文學雜誌、文社好像也和他無關。比如說：蔡其矯介紹他去結識舒巷城，他就寫信託《七十年代》轉交，與舒巷城通信許久，獲得前輩許多指點，但是始終沒有勇氣見面，直到新加坡作家林臻來港，在林臻的「強迫」下兩人才得以會面。後來陶然做時代圖書公司編輯、中新社編輯，一直到《香港文學》編輯、主編，他才廣交文友，並且成為很多年輕作家的提攜者。

作為這樣一個南來北往作家，陶然和其他南來作家最大的不同，是我最關注的問題。陶然坦然道出：「許多所謂南來作家，他們對文學談不上獻身，只是利用文學進行交遊，他們的名片上一大堆頭銜，作品卻貧乏欠缺，這形成了大眾對南來作家的負面印象，這令我覺得很淒涼——南來作家本來並